文章编号: 1003－7721(2010)04－0037－06

李兴梧

欧洲六声转调与中国五声“旋宫”异同辨析

摘 要: 在七声音阶体系建立之前, 欧洲音乐的音阶体系是六声音阶体系(A system of hexachords)。六声音阶体系中的六声转调—Mutation, 是一种旋律意义的转调, 其思维和手法与中国传统音乐一均三宫理论和旋宫转调实践有许多不谋而和之处。本文旨在对这两种异域音乐中的转调现象,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对比与分析, 试图说明两种异域音乐文化中的某种共性特征。

关键词: 六声音阶体系; Mutation; “旋宫”; 转调; 一均三宫

中图分类号: J613.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721.2010.04.005

转调是音乐创作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之一。转调, 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称作“旋宫”, 在欧洲近代音乐理论中称作“Modulation”。“旋宫”所涉及为单声部音乐中的转调, 即: 旋律意义的转调; Modulation 所涉及的主要是多声部音乐、尤其是功能和声意义的转调。显然, “旋宫”转调和“Modulation”转调并不是一回事, 两者的外延与内涵异多同少。那么, 欧洲音乐是否存在过与中国“旋宫”转调特征相似的转调？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欧洲早期音乐的音阶体系—六声音阶体系中的转调—Mutation。欧洲六声音阶体系产生于公元 11 世纪, 至 17 世纪时, 六声音阶体系逐渐被七声大—小调音阶体系所取代。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宫”理论体系产生于公元前的春秋战国至汉初期间, 该理论体系一直沿用到当代。“旋宫”理论比欧洲六声音阶理论的产生时代早一千多年。

欧洲 Modulation 转调实践约萌生于 16 世纪, 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在 18 世纪上叶形成。在此之前的转调, 是一种基于六声音阶体系(A system of hexachords)、基于单声部音乐或旋律意义上的转调—Mutation(这个词的原意是更换、转变等, 作为音乐术语也被译为“换调”[1]或“唱名移位”[2])。笔者在研究中发现, 六声音阶体系中的 Mutation 转调与中国传统五声音阶体系中的旋宫转调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对这两种异域音乐中的转调进行对比分析, 试图说明两种异域音乐文化中的转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似性特征。为了表述方便, 本文拟将欧洲早期音乐中的六声音阶转调“Mutation”简称为“六声转调”。下面, 笔者将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对欧洲早期音乐中的六声转调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五声转调进行比较研究, 探讨两类转调的异同性。

一、六声音阶体系与六声转调实践

1.六声音阶体系

欧洲音乐在最近一千年历史进程中, 经历了从六声音阶体系到七声音阶体系逐步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早在 17 世纪七声音阶体系建立之前, 欧洲音乐的音阶体系是六声音阶体系。六声音阶体系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时期, 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六声唱名法体系, 两者在音乐理论和实践中相互映衬依托。据传, 六声音阶体系与六声唱名法体系最早皆由中世纪意大利阿雷佐地区的教会音乐家圭多·阿雷佐(Guiduo d' Arezzo, 约 995－1050)于 11 世纪上叶创立的。作为教会音乐学校教师, 圭多建立六声音阶体系与六声唱名法的目的,

作者简介: 李兴梧(1956～), 男, 文学硕士, 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成都 610021)。

收稿日期: 2010-03-22

最初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音乐教学手段,以使学生的读谱视唱训练方式简便易行。由于六声音阶体系与六声唱名法在圭多的教学实践中获得成功,遂为欧洲各地教会的音乐创作与训练活动所普遍采纳。因其在音乐理论教学、音乐创作和歌手读谱视唱训练等方面所具有的许多优点,使得这套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在11世纪—16世纪期间一直得到广泛应用,直到17世纪,它们才被后起的七声音阶体系和七声唱名法体系、以及大小调音乐创作实践所取代。

六声音阶体系为自然八音列,其中包含着三个调高不同的六声音阶。以C自然八音列为例,其中包括:C六声音阶(C Hexachord, Nature hexachord)、F六声音阶(F hexachord, Soft hexachord)和G六声音阶(G Hexachord, Hard hexachord)。六声音阶体系及其所属各调之间的关系可以图1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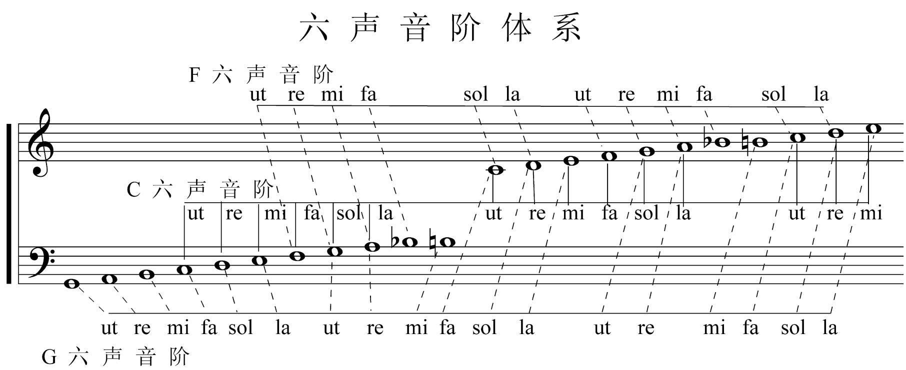


图1 C自然八音列

上例六声音阶体系有如下特点:

1) 在一个C自然八音列中,共有G、C、F三个六声音阶。各六声音阶的音程关系相同,其首调唱名依次为ut①—re—mi—fa—sol—la。

2) 每个六声音阶中只有一个小二度,它必须唱成"mi—fa"。在一个自然八音列中,共有三个音高不同的小二度,故能形成三个音高不同的六声音阶。

3) 六声音阶体系中的全部音高共有八个,除♭B音外,其余都为自然音。♭B音是中世纪音乐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唯一允许使用的变化音。中世纪音乐理论把自然八音列以外的音称作"伪音"(Musica ficta),禁止使用,因此,一个自然八音列中六声音阶最多不会超过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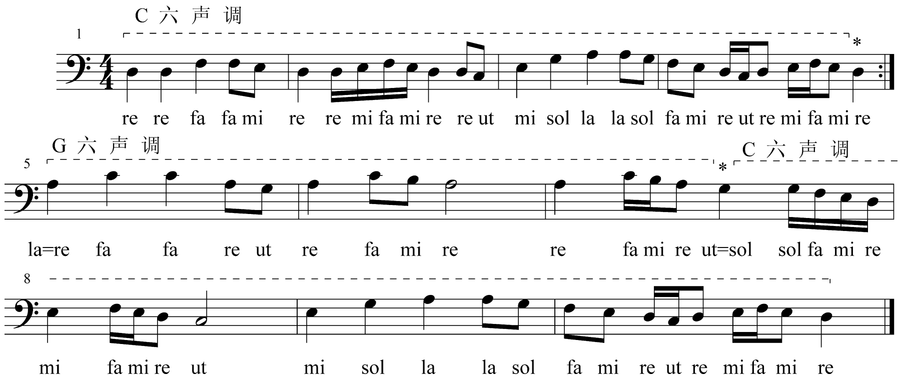
2.六声转调实践

六声转调Mutation类似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旋宫转调"。欧洲早期音乐实践以六声音阶体系为基础,这里试将早期乐曲中的六声音阶特性的曲调称为"六声调"。六声转调即乐曲中六声调之间的转换。在欧洲中世纪音乐中,六声转调现象非常多见,其转调范围,理论上允许在"C自然八音列"体系中的G、C、F三个六声调之间自由进行(见图1所示),不过,在音乐实践中,六声转调通常只在两个近关系六声调之间进行。训练有素的咏唱者会在演唱过程中正确熟练地运用六声唱名法规则,做出正确的唱名更替,从而形成转调。六声转调实践如下列谱例1.2.3.所示:

1)《巴勒斯坦之歌》是一首13世纪德国世俗音乐作品,由恋诗歌手(Minnesänger)福格尔魏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德,生卒年不详)作于1228年。

谱例 1

巴 勒 斯 坦 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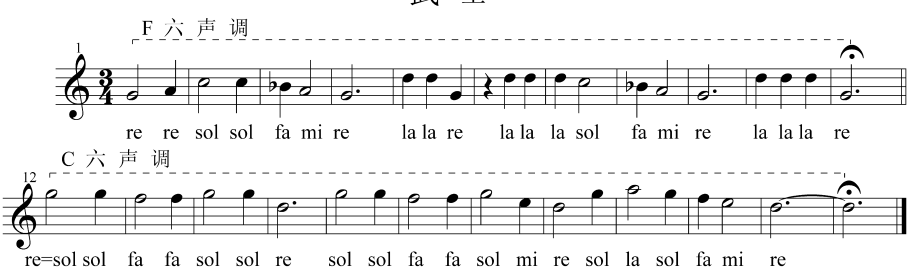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之歌》中的六声转调为：C 六声调→G 六声调→C 六声调。调回归，以 C 六声调为主。

2)《武士》(Homme Armé, L’)是一首古老的法国民歌，15 世纪被勃艮第作曲家迪费(G · Dufay，约 1400—1474)是用这首歌曲作为定旋律，创作出《武士弥撒曲》。在之后的 16 —17 世纪中，该民歌曲调先后被包括意大利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G · P · da Palestrina)在内的 20 多位作曲家引用，作为其弥撒曲的定旋律。

谱例 2

武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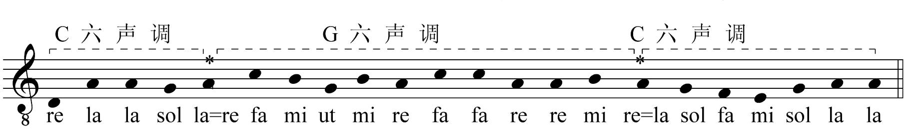


这首歌曲中的六声转调为：F 六声调→C 六声调。调不回归，F 六声调和 C 六声调不分主次。

3) 慈悲经：《创造万有的上帝》(Kyrie：Cunctipotens Genitor Deus)[3]。该曲是一首格里高利素歌，属于弥撒曲中的常规弥撒。虽然它的六声音阶形式相当不完整，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它的唱名交替过程清楚地辨明其的六声转调特征。

谱例 3

慈 悲 经 ： 创 造 万 有 的 上 帝



此曲的六声转调为：C 六声调→G 六声调→C 六声调。调回归，以 C 六声调为主。

从上述分析可知，理论上，同一自然八音列可衍生三个调高不同的六声调；实践中，六声转调通常只在同一自然八音列中的一对近关系六声调之间进行。

有一点需要注意，六声音阶体系在实际运用中，并不要求每个六声调的所有音都必须全部出现，其六声音阶既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不完整的。如：在谱例 1. 中， C 六声调的 ut—re—mi—fa—sol—la 六个音俱全，音阶是完整的，G 六声调只有 ut—re—mi—fa 四个音，音阶是不完整的。又如：例 2. 中，F 六声调和 C 六声调都只有—re—mi—fa—sol—la 五个音；例 3. 中，C 六声调仅有 re—sol—la 三个音、G 六声调仅有 ut—re—mi—fa 四个音，例 2. 3. 中六声调的音阶形式都是不完整的。六声转调出现的前提是：乐曲中只要出现小二度音程，六声转调就必然出现。

毋庸置疑，六声转调现象在 11—16 世纪欧洲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两个领域中都存在。从某种意义上

说，早期的六声转调为后来的七声转调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一均三宫”体系与旋宫转调实践

1.“一均三宫”体系

“一均三宫”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术语。该理论体系中的“均”，通常指一个自然七音列系统，“三宫”，指在一个“均”中所包含的三个关系较近的异宫五声音阶。如：以 C 均（C 自然七音列）为例，其中含 G、C、F 三个结构一致调高不同的五声音阶。这种理论可以图 2 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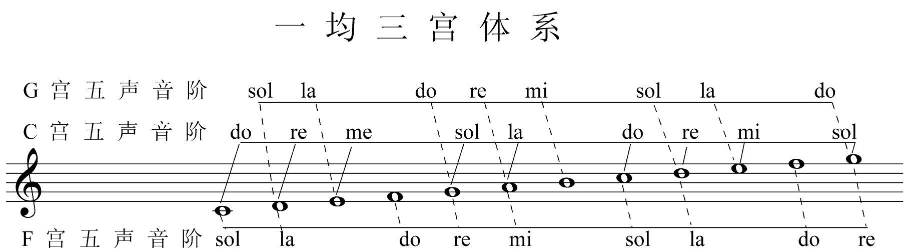


图 2 C均（C 自然七音列）

图 2. 所示的“C 均三宫”系统，它有如下特点：

1）在一个 C 自然七音列—C 均中，共有 G、C、F 三个调高不同的五声音阶。各五声音阶的音程关系相同，其首调唱名依次为：do— re—mi—sol—la。

2）每个五声音阶中只有一个大三度音程，即“宫—角”（do—mi）。各五声音阶中不含小二度。在一个自然七音列中，共有三个音高不同的大三度，故能够（或只能够）形成三个音高不同的五声音阶。

3）“一均三宫”体系中的全部七个音高都是自然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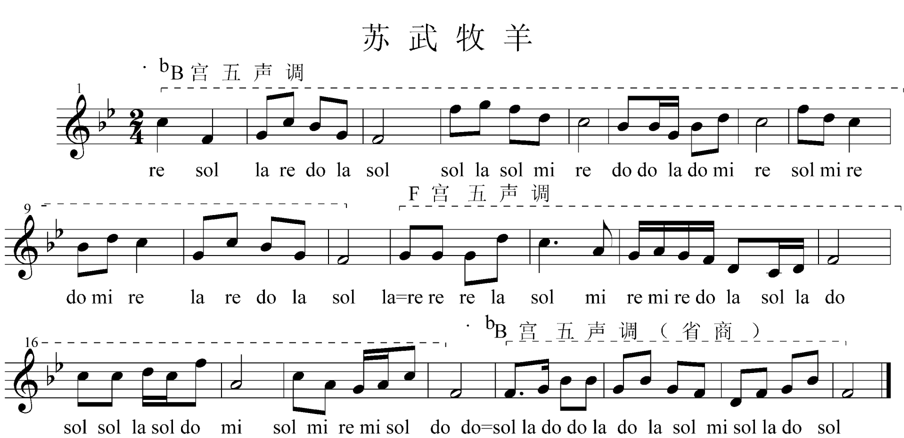
2. 旋宫转调实践

旋宫转调是中国传统音乐术语，指旋律意义上的转调或离调，即单声部音乐类型中的调变换。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前后的春秋时期，中国音乐理论就有“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之说[4]，这里的“旋相为宫”在今天的许多学者看来，即旋宫转调，亦简称为“旋宫”。

一均三宫体系中的五声音阶在乐曲中称作“五声调”。在中国传统五声调乐曲中，旋宫转调现象非常多见。将其用当今的五线谱记谱，其中的近关系转调通常无需改变调号，而只需变换乐谱的首调唱名即可。这种现象如下面的各乐谱所示：

1）《苏武牧羊》。这是一首著名的中国古曲，其曲调的音阶系统为♭B 均。

谱例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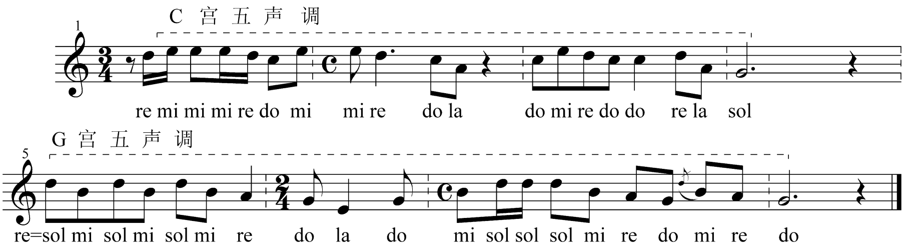
《苏武牧羊》中的旋宫转调过程为：第 1—11 小节为♭B 宫五声调（F 徵调式）→ 第 12—19 小节为 F 宫五声调（F 宫调式），“变宫为角”→第 20—23 小结回到♭B 宫五声调（F 徵调式）。调回归，♭B 宫五声调（F 徵调式）为主。

该乐曲的第1—19小节为完整五声音阶，第20—23小节的五声音阶因省略商(re)音而不完整。

2)《手攀杨柳望情哥》。这是一首著名的江苏民歌，其曲调的音阶系统为C均。

谱例5

手攀杨柳望情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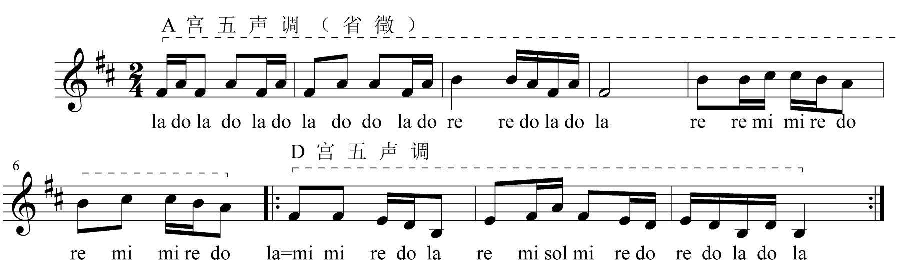


该乐曲的第1—4小节为C宫五声调(G徵调式)→第5—8小节为G宫五声调(G宫调式)，“变宫为角”，调不回归。其中的C宫五声调(G徵调式)和G宫五声调(G宫调式)不分主次。上下两乐句的五声音阶皆完整。

3)《黄杨扁担》。这是一首著名的四川民歌。

谱例6

黄杨扁担



第1—6小节为A宫五声调(♯F羽调式)→第7—9小节为D宫五声调(B羽调式)，“清角为宫”，“旋宫”前后两部分曲调的调式相同，调不回归。

该乐曲的第1—6小节为不完整五声音阶(省略徵音)，第7—9小节为完整五声音阶。

“一均三宫”体系反映中国传统音乐实践中的一种极为常见的五声调旋宫转调现象。理论上，旋宫转调在同一“均”内的三个异“宫”五声调之间任意进行；实践中，旋宫转调通常只在同一“均”中的一对近关系“宫”五声调之间进行。

旋宫转调由大三度的位置确定。如：当前调的“宫”降低小二度成“变宫”时，“变宫”即为后调的“角”，前调的“徵”则成为后调的“宫”(见谱例4.5.)，此即所谓“变宫为角”；又如：当前调的“角”升高小二度成“清角”时，“清角”即为后调的“宫”，前调的“羽”则成为后调的“角”(见谱例6.)，此即所谓“清角为宫”。

与前述的六声转调情况相同，中国乐曲中的五声转调，各五声调的五个音高也无须俱全，其五声音阶既可以是完整的，如：谱例1.3.所示；也可以是不完整的，如：谱例1.3.所示。此不赘述。

三、六声转调与五声旋宫异同比较

综上所述，无论欧洲的六声音阶体系，还是中国的“一均三宫”体系，它们都有一些相同与相异之处。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

1.理论上的“一均三宫”，实践中的“一均二宫”

理论上，六声音阶体系和“一均三宫”体系类似，即：在一个音列体系—“均”中，并存三个“调”(见图1和图2)。

实践中，无论是六声转调还是旋宫转调，两者的转调范围大都是“一均二宫”，即：一首含有转调的乐曲，

其转调通常只在一对近关系调中交替(见谱例 1.2.3.4.5.6.)。很少出现三调共存于一首乐曲的现象。

2.定调与转调皆决定于 一个特殊的音程

中国的五声调音乐以其唯一的大三度旋律音程来确定其五声调的调高，这个“宫－角”大三度音程必须唱作“do－mi”。当曲调中出现“变宫为角”或“清角为宫”时，do－mi 随之做出相应移位，五声音阶的唱名随即做出相应调整，形成五声“旋宫”转调(见谱例 4.5.6.)。一首曲调中只要有两种以上大三度，则五声转调必然出现。

欧洲六声调音乐以其唯一的小二度旋律音程来确定其六声调的调高，这个小二度音程必须唱作“mi－fa”。当曲调进行中出现小二度位置变更时，mi－fa 随之做出相应移位，六声音阶的唱名随即做出相应调整，形成六声转调(见谱例 1.2.3.)。一首曲调中只要出现两个以上不同音高小二度，则六声转调必然出现。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1.“均”音列与“调”音阶不同

六声音阶体系的“均”为自然八音列，“调”音阶为六声音阶。一均三宫体系的“均”音列为自然七音列，“调”音阶为五声音阶。

2.定调、转调的音程不同

六声音阶体系的定调、转调音程是小二度。一均三宫体系的定调、转调音程是大三度，其中的三个“宫”五声调皆不含小二度。

3.“偏”音及其定位不同

本文试将上述两种音阶体系中只被一个音阶(或一个调)所使用的音高称作“偏”音，如：C 自然八音列中的“B”音和“bB”音；C 均中的“B”音和“F”音。

在理论上，六声音阶体系 C 自然八音列中的“B”音只在 G 六声音阶中作“mi”，“^{b}B”音只在 F 六声音阶中作“fa”，并且，B 和^{b}B 二音绝不会同在一个六声音阶中；一均三宫体系“C 均”中的“B”音只在 G 宫五声音阶中作“mi”，“F”音只在 F 宫五声音阶中作“do”，并且，B 和 F 二音也绝不会同在一个五声音阶中。

同理，在音乐实践中，B 和^{b}B 二音绝不会在同一个六声调中出现；B 和 F 二音也绝不会在同一个五声调中出现。

欧洲多声部音乐中的转调，建立在七声大－小调式及多声部音乐的基础之上，其系统理论最初的形成时间，通常以 18 世纪法国音乐家拉莫(J。P。Rameau，1683－1764)于 1722 年撰写《和声论》的时间为准。这种基于功能和声的七声大－小调音乐的转调，其前身正是基于旋律意义的六声转调。

曾有人说，欧洲早期音乐是“一调到底”，或说，欧洲音乐不懂“旋宫”之法。其实不然。从以上音乐分析不难看出，欧洲早期音乐中的六声转调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五声转调，两者皆体现出一“均”三“宫”思维和“旋宫”转调手法，从理论到实践皆反映出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注释：

①16 世纪以前的首调唱名 ut，在 17 世纪以后大都改唱 do。

[参 考 文 献]

[1] 李兴梧.欧洲早期多声部音乐的结构及其演变[J].黄钟，1990(1).
[2] [美] 格劳特著、汪启章等译.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 同[2].
[4] 礼记。礼运[M].

[其他参考文献]

[1]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ited by Stanley Sadie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0.
[2]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2nd Edition Edited by Willi Apel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下转第 61 页)

Remarks on Some Key Issues in Music Criticism

YANG Yan-di

more discussions about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practices of music criticism. Based upon ideas of other scholars and critics, the author proposes his own point of views about some basic issues in music criticism, such as the object and definition, the task, the special difficulties, the standards and criteria of music criticism, and also the ideal qualifications about music critic.

Key Words: Music criticism, music aesthetics, methodology of musicology, composer, composition, music performance

（上接第 42 页）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Modulation in European Hexachords and Xuangong in Chinese Pentatonic

LI Xing-wu

Abstract: It had been a system of hexachords in European music before the heptatonic scale established. The mutation in a system of hexachords was a modulation with the melodic significance, which both of ideas and technique similar to the theory of Yijun Sangong and practice of Xuangong modul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For the phenomena of modulation in different music style of foreign lands, the paper comparative analyzed them from both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showed some certain commonality between two kinds of foreign music cultures.

Key Words: system of hexachords, mutation, Xuangong (transition), modulation, Yijun Sangong